

◀ (上接6版)

现在我尽量用古遗传学材料验证或完善自己的结论。虽然这种研究需要很长时间，有些检测结果我可能很难取得，但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了。

文汇报：我们了解到，您特别重视科学知识的推广及考古人才的培养，还担任了《第一手科学》(SCIENCE First Hand) 科普杂志副总编辑。您如何看待公众考古学？开展公众考古学是否有必要？

波罗西玛克：曾经考古学的普及妨碍了我们的科学研究。我们在阿尔泰山进行的研究成果普及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必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大众了解。如果让非专业人士普及考古学知识，这会严重影响正确的考古学知识普及。所以我认为，学者从保护自己的职业环境出发，应该自己普及自己的科研成果，否则公众会对这些研究成果理解产生偏差。因此，我最近写了相当多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只是叙事风格比较通俗，内容则相当严谨、科学、客观。我在这些科普文章中，敢于写一些我在学术文章中不敢写的东西，这也是科普文章与专业文章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第一、考古发掘成果大众化是必要的；第二、考古学家必须亲力亲为，不要将这项工作交给非专业人士去做。不少记者往往追求轰动一时的消息，容易歪曲事实，造成大众对考古学的误解，导致正常工作无法进行。所以，考古学家自己普及考古是至关重要的。

文汇报：能否对青年考古学生提供一些学习和研究的建议？

波罗西玛克：目前，年轻考古学家拥有比我们这一代考古学家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跨学科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古遗传学等新的领域，很多新技术设备(无人机、新的照相机、摄像机)应用到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这些都减轻了考古学家的工作重担，使我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中。这些新的技术是当时没有的。当然，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他们就可以在研究以及展示研究成果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不要错过现代科学与现代世界为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可能性，尽力利用这些可能性并找新的前进道路。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最终研究的还是人。有时候过度拘泥于技术，就会忘记考古学研究对象不是遗物，而是人。此外还应该多参与考古发掘，积累经验，明确目标，最终收获成功。

连接起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

蒙古对欧亚的持久影响(下篇)

文/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 译/施美均

尽管波斯人本来就对大米有所了解，但与中国的交往使得波斯大规模种植大米，而且在菜肴中更多地使用大米。被中国人认为有药用价值的大黄也传入了波斯。波斯菜肴肯定受到了传入波斯的中国农产品的影响，比如大米、米酒、还可能有粉丝。拉施特受到了极大启发，写作了一本有关农业的著作。

蒙古对中国的影响

蒙古人带来了如此深入的融合与交流，但蒙古崩溃之后是否留下了持久的遗产呢？中国是考察蒙古遗产的最佳地点。1368年掌权的本土王朝大明宣称其渴望摆脱蒙古的影响。起初，明朝废弃了蒙古鼓励欧亚与中国之间自由通行的政策，他们禁止了域外联络，对远近的通商和朝觐使团也加以限制。不过这种类似“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真正施行。比如从1392—1450年韩国曾派遣391名所谓朝觐使节来中国，来自满洲的女真族、日本、泰国及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的帖木儿地区等地的公使和商人都曾到过明朝。不过明确的政策也带来相当多的限制，从而阻止了另一场域外入侵，避免了重蹈所谓“蒙古铁轭”(the Mongol yoke)的覆辙。

既定政策以外，还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蒙古对明朝产生了影响。比如，元朝覆灭之后依然有大量蒙古人决定留在中国当翻译或者加入锦衣卫。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聘用忠诚的蒙古人担任这些职务，一些蒙古人为了躲避蒙古的动荡而在中国定居，朝廷给他们提供了大米俸禄，还为他们的马匹分配了牧场和干草。皇帝不想一味贬低元朝，而是对元朝皇帝们给予尊重，因为他们曾守护天命并招募能干的儒家学者当顾问。更重要的是，几位明朝帝王公开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蒙古的基础之上。几位学者最近指出，这些皇帝采纳了元朝皇帝所说的普遍统治，将自己刻画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后继者。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甚至把自己塑造成忽必烈的接班人。利用蒙古遗产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彼时一种建立在科举和官僚制

之上的新的精英阶层出现，取代了更多以军事为本的明朝统治者。

明代借鉴了蒙古的军事体系，这是可以肯定的。正如研究明朝军事的专家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所说：“有意创造一个高于科举制的军事精英阶层，这标志着中国本土王朝的新起点。”明朝延续了蒙古的政策，建立了一个登记在册的世袭军官阶层，这个阶层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明朝还采纳了蒙古军事组织方式的一些特征——以十进制为基础，千户所是基本单位，五个千户长组成一个卫，整个体系依靠屯田制运转。屯田制是源于中国的制度，但在元朝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屯田制下的士兵同时也耕种以自给自足。新建立的军队除了贴身保护皇帝的锦衣卫以外，都由枢密院集中控制。明朝因此表现得比上一个本土王朝——宋朝——更为重视军事，这似乎是蒙古影响的

表现。明朝留下了比所有之前朝代加起来还多的军事文献，这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巧合。

明朝强化了对地方官僚体系的监管。明代沿用了都察院，这一机构在元朝之前就存在，但在蒙古统治下都察院的职能“远为普遍”。明朝御使到中国各地巡查，监督地方官员。在巡查过地方政府之后，御使直接将关于官员失信于民、无能、渎职的报告呈交给皇帝。这个体系强化了明朝的专制统治，因为皇帝掌握了武器来应对试图掌控官僚机构的文士——主要是通过指控他们腐败和结党营私。总之，这样的观点至少部分属实——“明朝直接承袭了蒙古政权的官僚架构，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明朝皇帝认同其蒙古前辈们的政治传统，并且为之有意识地做出了努力”(Okada Hidehiro, “China as a Successor State to the Mongol Empire” 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ited by Reuven

Amitai -Preiss and David Morgan. Leiden: Brill, 1999, p. 265)。

元朝统治对明朝产生了文化上的影响。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蔓延到了明朝。明朝皇帝朱棣多次邀请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到朝廷来，还赠送珍贵的礼物给藏传佛教使节。与藏传佛教的联络往往能帮助明朝帝王塑造这样的形象——佛教的支持者和“普世的统治者”。帝国肖像画也对明朝统治者有影响。绘有明朝帝王狩猎图的画作或挂毯就是蒙古模式的反映，狩猎是典型的蒙古活动，狩猎图中的明朝帝王身着蒙古短袍和帽子，佩带弓箭展现骑马的雄姿。这些画作不仅反映了帝王的武艺，也体现出他们的吃苦耐劳，这样的刻画将传达帝国的荣耀和权力理念。蒙古的另一遗产在于认可波斯在天文学上的长足进展。继承蒙古先例，明朝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局，提供气候和天气信息是其职责之一。蒙古向案件中的受害方提供赔偿而不是惩罚他们，明朝的法典有时也采用这样的措施。蒙古对地理学研究的推动在明朝这里也有回响，明朝主持编纂了多本地理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明一统志》，以及绘出了西亚和北非的精细轮廓的《大明混一图》。医生、占星家和占卜者都地位提升，这是蒙古影响下的另一产物。与此同时，明朝皇帝创建了会同馆和四译馆，表明他们需要对外有所了解的专家，也表明明朝的孤立和限制境外交往的政策并不成功。

蒙古的其他影响有关日常生活和活动。部分蒙古词、二胡和一些被中国菜肴吸收的食物就是具体的例子。强奸、纳妾和通婚使得蒙古血统混入了中国人的基因库，西方和中亚人的相当一部分基因片段里已经发现了蒙古DNA，但蒙古对中国人的影响程度尚未被充分研究。



《史集》中的蒙古士兵



波斯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史集》，是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图为中译本书影(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